

全球产业链重构 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培育

杨志浩 张其仔

摘要:当前全球产业链呈现“慢全球化”“再中心化”“超敏感性”三大特征。中国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位置由产业链下游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嵌入模式由产品出海模式向产能出海模式演进,嵌入空间由全产业链远岸化向异质性产业链差异化转变。美国是推动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力量,打破日益收敛的经济稳态、推动全球比较优势“大洗牌”是美国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底层逻辑。为实现这一战略目的,美国对华采取了科技封锁、制造回流、资源掠夺、秩序扰乱等策略,试图削弱中国制造业在相对效率、规模经济、制度成本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最终形成结构性势力。应对此挑战,中国要依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提升新兴产业的生产效率,防止新旧产业的生产效率趋同化,培育效率型比较优势;依托数字经济背景下不断涌现的数据要素及其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多元化组合,实现生产要素种类倍增和质量跃升,培育要素型比较优势;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从国内国际双重视角实现更高层级的规模经济,培育规模型比较优势;依托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契机,大幅削减开放型经济的制度成本,培育制度型比较优势。应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指导,统筹效率型、要素型、规模型、制度型四类比较优势行业的发展方向,形成结构型比较优势的构建思路。

关键词:产业链重构;比较优势;制造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5)09-0080-10

当前,全球产业链正处于加速重构期。现有观点认为,以美国为首的逆全球化势力人为阻断了国际分工,世界各国出于安全考量被迫在效率和安全之间寻求战略平衡,最终导致全球产业链陷入重构漩涡^[1-3]。从现实逻辑来看,美国对华贸易摩擦是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主要推动力^[4],而2001年以来中美日益收窄的经济差距是美国打压中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原因^[5]。中国经济崛起似乎是美国推动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自

然逻辑。然而,这一逻辑无法解释为何近期美国在对华加征关税的同时,也把关税大棒挥向美国的其他贸易伙伴,如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从学理逻辑来看,无论是基于李嘉图的相对效率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还是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的规模经济论,中美两国利用各自比较优势都能在参与国际分工中获利^[6]。与此同时,由于任何经贸关系的中断和重联都面临摩擦损耗,因而以安全为导向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必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标准开放对我国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24CJY011);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提升我国创新链国际竞争力”。

作者简介:杨志浩,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其仔(通信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

然会增加所有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交易成本。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理论^[7],全球产业链交易成本的增加同样会削弱美国的比较优势。既然如此,美国为何仍要倒行逆施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美国推动下的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会产生哪些冲击?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究。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典型特征:总体趋势及中国角色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趋势的典型特征

全球产业链演变规律的深刻调整驱使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最终呈现“慢全球化”“再中心化”“超敏感性”三大特征。一是慢全球化。“慢全球化”表现为全球产业链仍朝着全球化的方向演进,但国际分工的外延空间明显收敛,纵深发展速度大幅放缓。21世纪初,无论从贸易的广延边际还是集约边际来看,全球贸易均保持较高增速,全球贸易格局呈现“超级全球化”趋势。由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发现,2000—2007年全球出口贸易额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11.7%。然而,近年来,全球贸易的广延边际和集约边际大幅收窄,2008—2013年全球出口贸易额年均复合增长率跌至3.3%,2013—2024年进一步跌至0.7%。贸易是产业发展的表象,贸易的缓慢增长意味着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呈现“慢全球化”特征。二是再中心化。“再中心化”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网络的核心枢纽国发生明显变化。21世纪初,全球产业链主要表现为“双极结构”特征,美国是整个亚太地区产业链网络的核心枢纽国,而德国则是欧洲地区产业链网络的核心枢纽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逐步从全球产业链网络的边缘跻身至核心枢纽位置。与此同时,亚太地区的产业链网络分裂为以美国为核心的北美板块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板块,全球网络格局呈现“三足鼎立”之势^[8]。不仅如此,中国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

经济体两大价值环流之间承担了重要的枢纽功能^[9],并在亚洲板块发挥着引领作用。本文使用PageRank算法和全球双边贸易数据测算发现,2023年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度远超日本,网络中心度数值约为日本的4.5倍。三是超敏感性。“超敏感性”表现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市场主体对外部冲击出现了超敏反应,导致全球产业链韧性下降,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振幅显著增大。根据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测算方法及其最新结果^[10],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始终维持在历史高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在2025年3月激增至2000年以来的最高点,为2000年同期的9.5倍。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持续上升导致全球经济预期转弱,对外部冲击的敏感性激增,最终导致全球产业链的脆弱性显著提升^[11]。

(二)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典型特征

中国经济具备典型的大国经济特征,在影响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同时,也深受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反作用影响。近年来,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参与呈现如下特征:第一,嵌入位置由产业链下游向产业链上游延伸。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初期,中国主要通过承担全球产业链的加工组装环节,嵌入全球产业链下游。随着工业体系的成熟和完备,中国嵌入全球产业链的位置开始向上游延伸,突出表现为中间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稳步提升。由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发现,中间品出口占中国总出口的比重由2001年的38%上升至2024年的47%。第二,嵌入模式由产品出海模式向产能出海模式演进。21世纪初,中国主要通过产品出海模式嵌入全球产业链,“中国制造”享誉全球。近年来,一方面,在美国对华“脱钩断链”和新兴经济体加快产业替代的双重挤压下,中国对全球产业链的嵌入模式被迫转为产能出海模式,部分制造业企业被动外迁至东南亚和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国内部分制造业企业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具备了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能力,因而选择主动在海外投资设厂。根据商务部提供的数据,2024年末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存量达到3388.9亿美元,约为2013年末的8倍,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10.8%。大量来自中国的制造业投资流入发达经济体市场,2024年中国对欧盟的制造业投资存量达397.7亿美元,对美国的制造业投资存量达268.9亿美元,二者之和占中国对外制造业投资存量的约20%。第三,嵌入空间由全产业链远岸化向异质性产业链差异化转变。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主体致力于开拓更大范围的市场,因而产业链在自由贸易环境中通常呈现远岸化的发展趋势。当安全考量愈发重要时,市场主体不再单纯以效率为导向,产业链发展状态也将由远岸化转向近岸化。近年来,中国高技术产业链呈现近岸化趋势,但中低技术产业链仍然维持远岸化趋势。究其原因,与高技术产业链相比,中国中低技术产业链的比较优势更大,抗冲击能力更强,即便面临外部冲击仍维持远岸化趋势。相反,高技术产业链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弱势环节,近岸化发展契合安全驱动下中国市场主体以保障高技术产品稳供给为导向的现实逻辑。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底层逻辑及其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一)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底层逻辑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美国主导构建了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多边贸易体制。借助在多边贸易体制中的话语权优势,美国在过去80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主导着全球分工格局,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一。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产业链体系,同时也为全球产业链注入新动力。21世纪初期的全球产业链整体上服从传统的效率主导型国际分工理论规律,即生产效率是全球产业链分工布局的主导因素。然而,近年来,世界各国对产业链

安全的关注度急剧上升^[12],全球产业链演变遵循的一般规律已经由原来的效率主导型国际分工转向新形势下的安全和效率统筹型国际分工。从经济实力的相对比较来看,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美经济差距明显缩小。2021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一度达到美国的77%。尽管近年来这一比重有所回落,但仍维持在65%左右。中美经济差距的缩小似乎是美国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有证据表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崛起对美国的冲击有夸大之嫌。以劳动力市场为例,现有研究认为尽管来自中国的进口冲击了美国劳动力市场^[13],但只是暂时性的影响,随着美国劳动力市场的自我调整,来自中国的冲击会逐步消解^[14]。与此同时,中国在相对劣势领域对世界前沿生产率的赶超,有助于提升全球绝大部分经济体的社会福利^[15]。除此之外,部分研究认为,中国在参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分工时,主要承担价值链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甚至一度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16],这似乎亦有利于美国维护其全球产业链的霸权地位。更加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以来,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径已经不局限于对华贸易摩擦,而是面向全球加征高额关税。即便是加拿大、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盟友,抑或在区域贸易协定方面亲近美国的越南、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也未能幸免。那么,美国推动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解释美国的逆全球化行径,依然要回归到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范畴。比较优势是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其演化经历了由李嘉图相对效率论、赫克歇尔—俄林要素禀赋论等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向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规模经济论等内生比较优势理论,再向杨小凯纳入交易成本考量且兼顾内外生比较优势的超边际经济理论、林毅夫考虑随时间变化且禀赋结构内生的新结构经济理论进阶。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相比,基于相对效率、要素禀赋和规模经济开展国际分工会

带来各国经济效率的整体提升。不仅如此,任何经济关系的中断和重联都会造成摩擦损耗,以安全为导向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必然会增加所有国家参与全球分工的交易成本。根据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理论,全球产业链交易成本的增加无疑会削弱美国的比较优势。既然如此,为何美国仍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呢?其重要原因在于,只有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才能打破原已收敛的稳态,为美国扩大内生比较优势创造机会窗口。美国在历史上不断交替实施孤立主义和自由主义政策,是阐释这一现象的绝佳案例。每当霸权地位面临颠覆性冲击时,美国便会启动孤立主义模式,利用大国经济能够左右世界经济的这一特性实现对全球比较优势的重置。近年来,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中国+1”策略,这虽然增加了美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交易成本,但同时也是对美国制造业相对效率和规模经济等比较优势源动力的“再培育”。只要源动力“再培育”为美国带来的长期经济足以覆盖交易成本上涨引致的短期不经济,美国便可以依托全球产业链重构实现比较优势的跃升。因此,本轮全球产业链重构是美国推动下全球比较优势的“大洗牌”。

(二)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影响

当前,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再仅仅停留在劳动和资本等传统资源禀赋优势层面,而是不断向创新驱动下的相对效率提升、场景驱动下的规模经济扩张、改革驱动下的制度成本削减等更高维度进阶。在相对效率提升、规模经济扩张和制度成本削减等比较优势的源动力加持下,中国已经在诸多领域占据全球产业链的核心枢纽地位。例如,通过新能源技术的市场化和产业化,中国培育了众多极具效率的新能源车企,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成为世界汽车制造强国。然而,美国在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采取了科技封锁、制造回流、资源掠夺、秩序扰乱等举措,试图

削弱中国制造业在相对效率、规模经济、制度成本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第一,美国依托科技霸权封锁关键核心技术,试图改变中国制造业在相对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基于李嘉图的相对效率论,中国产业稳步发展的理想状态是,高附加值新兴行业的生产率在前沿技术驱动下以高于低附加值传统行业的增速发展,高附加值新兴行业相较于低附加值传统行业的效率优势逐步扩大,进而实现中国比较优势由低附加值传统行业向高附加值新兴行业转移。根据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数据,目前中国在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实现技术领先,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力装备、农机装备等领域的技术水平也接近世界前沿,具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的技术基础。在此关键节点,美国加强了对华技术封锁,出台了针对中国企业的出口管制“实体清单”。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的中国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属于新兴产业,现有研究表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通过阻碍知识流动、降低进口产品质量、挤出研发投入,抑制了中国企业的创新产出^[17-18],并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19]。美国此举在阻碍中国新兴产业生产率增长的同时,还会导致中国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的生产率差距收窄甚至趋同。一旦中国新兴产业在国内产业体系中难以形成相对效率优势,国内外优质的技术资源和创新要素就难以在市场机制的驱动下自发流入新兴产业,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也就难以实现比较优势由低附加值传统行业向高附加值新兴行业的跃迁,最终可能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面临“低端锁定”问题。

第二,美国依托制造回流政策重塑“美国制造”,试图改变中国制造业在规模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基于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的规模经济论,中国产业稳步发展的理想状态是,国内产能在充足的市场需求支撑下不断扩大,形成领先全球其他经济体的规模经济优势。然而,近年来,

美国大力推动制造业回流本土,试图重塑制造业规模竞争优势,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制造业的相对规模优势。与此同时,在美国推动的友岸化、近岸化布局战略中,墨西哥、越南、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不断改善,对中国制造业的产能替代力持续提升,同样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分工的规模经济优势。在国际需求收缩的条件约束下,中国国内部分行业出现“内卷式竞争”。不仅如此,近年来国内市场的“内卷式竞争”还出现了明显的外溢趋势,价格战从国内市场蔓延至出口市场,突出表现为出口企业竞相压低出口产品价格,通过恶性降价争夺出口市场份额。“内卷式竞争”对中国制造业最直接的冲击是造成市场资源错配、管理成本加大、企业利润亏损,使得企业规模化的生产活动不可持续,最终导致整个行业陷入规模不经济。当前中国制造业在规模经济方面的比较优势,正面临“外患”与“内忧”双重挑战。

第三,美国依托经济霸权扰乱国际经贸秩序,试图改变中国制造业在制度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基于杨小凯的超边际经济理论,参与国际分工的制度成本是决定一国比较优势能否充分显现的关键因素。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利用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低关税发展契机开拓国际市场,使得劳动和土地的禀赋优势得以充分显现。然而,近年来,美国多次对华加征关税,频繁挑起贸易摩擦,限制中美两国产业链的直接关联。由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相关数据测算发现,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贸易额占美国进口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17年的21.6%下降至2024年的13.8%。与此同时,美国还加强了对转口贸易的审查力度,限制中美两国产业链的间接关联。根据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提供的数据,2016—2024年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处了299起涉嫌通过第三国转运、货物分类错误、税率分类错误等方式规避美国关税的独立案件,其中超过七成案件涉及中国。美国的上述逆全球化行径会

提高中国大量出口企业在对外贸易时面临的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的大幅提升会对冲其他类型的比较优势,迫使经济重新收敛至封闭经济形态。此外,近年来美西方正在构建一个“去中国化”的全球经贸制度体系,这一体系拉拢了越南、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表现为美西方与这些新兴经济体签署了大量自由贸易协定。美国更是直接升级了原产地规则核查系统,要求进口商提供产品生产工序流程图、原材料采购发票、能源使用与工厂运转明细等供应链追溯资料。不仅如此,美国还施压越南、新加坡、泰国、柬埔寨等国家加大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原产地审查力度。在美西方主导的全球经贸制度体系中,中国在某种程度上遭受了其“毒丸条款”的侵蚀,甚至面临被排斥在美国主导体系外的风险。美国依托经济霸权扰乱国际经贸秩序,由此引发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对中国制造业在制度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形成挑战。

第四,美国依托军事霸权掠夺全球要素资源,试图影响中国制造业在要素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随着国民财富的不断积累,中国在要素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已经不仅停留在传统的劳动和土地禀赋方面,还逐步向资本禀赋方面延伸。与此同时,中国利用广阔的发展契机、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多样化的应用场景,不断吸引全球高端人才、优质中间品和前沿技术涌入,形成要素禀赋优势。然而,近年来美国不断利用其军事霸权,掠夺全球要素资源,影响中国的要素禀赋优势。美国此举既表现为近年来利用军事手段直接掠夺中东国家的能源矿产资源,又表现为利用军事恐吓的方式干扰他国资本市场,引发资本恐慌并赴美“避难”。在美国依托军事霸权掠夺全球要素资源的背景下,中国对全球要素资源的配置力受到了一定影响。中国近年来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要素资源方面,资源获取能力的下降程度较技术含量较低的要素资源更为明显。美国依托军事霸权掠夺全球要素资源的行径,对中国制

造业在要素禀赋方面的比较优势构成挑战。

在美国的竞争冲击下,中国正在经历比较优势转换的阵痛期。从动态视角来看,美国推动全球产业链重构会影响内生的要素禀赋结构,改变最优生产结构,进而实现美国多维比较优势的螺旋式上升。美国多维比较优势的螺旋式上升对中国参与全球分工的比较优势将产生挤出效应。从结构视角来看,中国比较优势面临的冲击不仅仅是相对效率、规模经济、制度成本和要素禀赋等所遭遇冲击的简单叠加。这四种比较优势本质上仍然是基于成本考量的比较优势,而四者融合形成的聚合能力构成一国结构化的综合优势,决定着一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全球前沿科技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和结构性势力。美国当前驱动全球比较优势“大洗牌”的战略,更多的是依托自身的结构性势力,直接或间接地削弱中国基于成本考量的比较优势,进而谋求在中美大国博弈中掌握主动权。

三、培育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政策建议

基于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杨小凯和林毅夫等著名经济学家关于比较优势的概念界定,比较优势可划分为效率型、要素型、规模型、制度型和结构型五类。效率型比较优势的分类源于李嘉图的相对效率论,若某行业在中国国民经济行业中的相对效率处于前列,则定义该行业的比较优势为效率型。要素型比较优势的分类源于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若某行业密集投入的生产要素在中国属于相对充裕要素,则定义该行业的比较优势为要素型。规模型比较优势的内涵源于迪克西特—斯蒂格里茨的规模经济论,若国内某行业的全球市场份额处于前列,则定义该行业的比较优势为规模型。制度型比较优势的分类受到杨小凯超边际经济理论的启发,若国内某行业在贸易环节的制度成本处于全球同行业的较低水平,则定义该行业的比较优势为制度型。结构型比较优势

的分类受到林毅夫新结构经济理论的启发,大致的逻辑是一国在历史期的效率型、要素型、规模型和制度型比较优势,决定了该国当期在全球分工网络、技术网络等多个结构维度的国际地位,而各国在当期多个结构维度的国际地位,又构成其动态变化的禀赋结构,即结构型比较优势。针对不同类型的比较优势,本文提出差异化的政策建议。

(一)依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提升新兴产业的生产效率,防止新旧产业的生产效率趋同化,培育效率型比较优势

与传统产业相比,新兴产业具有高效率、高附加值等特征。一旦在美西方技术封锁下国内新旧产业的生产效率出现趋同化,中国新兴产业在相对效率方面的比较优势将会削弱。为此,应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机遇,加快提升新兴产业的生产效率。同时,扩大国内新旧产业之间的效率代差,将新兴产业打造为在效率方面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以此吸引更多优质要素资源自发流入新兴行业,最终实现国民经济体系经济效率的大幅跃升和产业结构的高端转型。在具体举措上,一要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机会窗口期,特别是要将“十五五”时期列为中国迈向世界科技强国和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期,加快提升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切实提升重点行业制造业企业的原始创新能力^[20]。二要优化科技创新体制,适当缩减重复性且边际效应微弱的创新活动的规模。尽管大量的试错被视为迸发颠覆式创新火花的有效途径,但当重复性和无实质意义的创新产出过多时,可能产生信息冗余效应,使得实质性创新成果埋没于海量的低端创新产出中,不利于提升创新成果转化率。三要积极探索培育创新友好型市场机制。从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经验来看,市场机制是催生科技创新和颠覆式技术进步的催化剂,但并非所有的市场机制最终都会引发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国

应加快探索和培育创新友好型市场机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避免政府之手过度干预创新要素资源配置,形成市场自发驱动下的创新自主激励机制。

(二)依托数字经济背景下不断涌现的数据要素及其与传统生产要素的多元化组合,实现生产要素种类倍增和质量跃升,培育要素型比较优势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城镇化建设趋于成熟,中国在土地和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方面的禀赋优势逐渐消减。步入数字经济时代后,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为丰富生产要素的多元组合、提升生产要素的整体质量提供了契机。因此,推动要素型比较优势行业的发展,应紧抓数字经济的时代机遇,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重要作用。在具体举措上,一要加快推动以数据为代表的新型生产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通过“数据要素x”行动将中国打造为以数据要素为核心的多重要素禀赋优势齐备的新型资源大国。二要加快完善数据交易市场建设,尽快破解数据确权难题,建立数据合规流通规则,完善数据定价评估机制。与此同时,进一步明确网信部门、工信部门、发改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在数据监管领域的主体责任,建立分级分类、软法硬法相结合的数据监管体系。进一步加强行业共性数据资源库建设,整合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扩大数据规模,同时加大公共数据资源供给,鼓励企业数据开放和数据共享。

(三)依托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和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从国内国际双重视角实现更高层级的规模经济,培育规模型比较优势

从国内循环视角来看,国内统一大市场有助于畅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大决定经济循环水平的关键节点,进而以国内循环为基础形成庞大的规模经济效应。加强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应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是加快完善统一市场基础制度。市场基础制度是统一大市场的“软

基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基础。要实行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统一司法裁判标准和法律适用,防止和纠正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采集、传输和应用标准,形成跨地区、跨部门的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治机制;加强对新业态的制度供给,建立健全数字经济领域的产权界定、流通交易、利益分配和安全监管制度,防止“规则洼地”和“监管真空”破坏全国统一大市场。二是加快统一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统一的市场基础设施有助于商品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是培育和形成规模经济的“硬基建”。要加快完善现代物流体系,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发展智慧物流、绿色物流,创新物流体系的组织服务模式;加快建设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切实缩减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流通环节,支持商贸流通企业“上云用数赋智”。三是统一政府行为尺度。严格规范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避免发达地区脱离地区要素禀赋和企业发展实际从欠发达地区“反向招商”;优化提升招标投标制度规范,消除企业所有制歧视,推行全过程信息依法公开。四是统一市场监管执法。市场监管执法质量是营商环境的重要体现,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市场监管执法规范化工作年度报告(2024)》,2024年市场监管系统查处案件数同比增长2.54%,罚没金额同比下降4.2%,实现了执法力度和温度的统一,但仍应切实解决国内部分地区市场监管中存在的多头执法、重复执法和违规异地执法等不统一问题。五是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要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打破地区分割、行业壁垒、制度性障碍,让生产要素能够依据市场规则实现高效、自由流动和配置。从国际循环视角来看,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未来中国开拓海外需求市场的重要方向。中国应继续加强“南南合作”,加强与“一带一路”国

家的互联互通,通过商签共同发展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等。通过拓展面向世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市场空间,形成庞大的外部需求,带动国内生产部门的规模化生产。

(四)依托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体制机制改革契机,大幅降低开放型经济的制度成本,培育制度型比较优势

传统的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以实现经济效率的最大化为目标,解决的是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在两个市场跨境流动的自由度问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通过扩大商品要素流动型开放,降低了两种资源在两个市场流动的制度成本。然而,现阶段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等方面仍然存在较为明显的制度壁垒,导致两种资源在跨境协同过程中出现适配障碍。例如,在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标准方面,中国与欧美国家存在标准不协调问题,导致出口海外的新能源汽车不得不采用多重充电设计方案,无形中增加了“走出去”的合规成本。因此,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是培育形成制度型比较优势的关键路径。具体举措上,一是坚定维护和改革多边贸易体制。中国应凝聚全球南方力量继续呼吁启动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成员遴选程序,鼓励经贸合作伙伴积极加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二是坚持主动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面对美国构建的带有地缘政治意图的区域合作架构,中国应坚持主动有序地扩大商品、服务、资本和劳务等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放宽外资持股企业、外籍技术和管理人才的国内市场准入。例如,在标准开放领域,主动破除外资持股企业参与国家标准制定的隐形壁垒,缩小政府宏观政策和企业微观感受之间的“温差”^[21];加快推动中外标准协调,进一步缩减商品要素跨境流动面临的标准壁垒及其引致的合规成本^[22]。三是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面对国内现行规则体系与国际高

标准规则体系的系统性差异,以及国内结构性改革面临的阻力,中国应坚持内外兼修策略。对内,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开展“压力测试”,主动对标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发挥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改革试点的示范带动作用,将局部试点和全局统筹相结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予以推广。对外,积极参与并引领数字经济和绿色低碳等新兴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提出既符合全球化发展趋势又体现发展中经济体核心利益诉求的“中国方案”。

(五)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为指导,统筹效率型、要素型、规模型、制度型四类比较优势行业的发展方向,形成结构型比较优势的构建思路

构建结构型比较优势的政策体系需要在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战略要求下,形成系统集成的政策合力。在结构型比较优势的政策供给过程中,需要对不同政策的共性、互斥性、互补性等特征进行综合考量,同时采用动态一般均衡的思路协同评估结构型比较优势政策的真实有效性。一是坚持事前预判。建议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司局组织产学研三大领域的专家学者,以纳入稳定政策、增长政策、结构政策的理论框架为遵循^[23],尽快建立一套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预判拟出台的政策对实现既定目标的增量贡献及其对其他政策目标的外部性干扰,避免因过度追求单一目标而引发其他领域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做好事中协调。政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不确定性事件的冲击,导致政策实施偏离原定的目标路径方案。为此,应建立跨部门协调和应急会商机制,充分发挥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在处理跨部门、跨领域问题时的制度优势。与此同时,要通过政策信息的统一归口和统一发布等预期管理策略,引导市场主体逐步向既定的政策目标靠拢。三是落实好事后评估。建议引入由第三方科研机构、高等

院校和行业协会组成的政策效果评估团队,基于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价体系,独立检验政策效果及其外部性。在此基础上,及时调整政策目标和推进机制,形成政策评估—反馈—优化调整的逻辑闭环,持续增强结构型比较优势。**Reform**

参考文献

- [1] 张其仔,许明,孙天阳.美国供应链报告的影响效应与中国应对[J].经济纵横,2023(9): 67-75.
- [2] 张其仔,许明.美国供应链霸凌对全球产业链分工与稳定的影响及应对[J].国外社会科学,2022(6):37-46.
- [3] 刘志彪,王兵.“对等关税”下全球产业链风险与“中国链”重构[J].国际商务研究,2025(4):1-15.
- [4] 杨志浩,杨丹辉.供应链通道国对中美供应链的影响及政策启示[J].国际贸易,2025(1): 25-33.
- [5] 张杰.中美经济竞争的战略内涵、多重博弈特征与应对策略[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3):1-22.
- [6] 张其仔,王磊,伍业君.重新定义比较优势:兼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转向[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9-20.
- [7] 杨小凯.发展经济学:超边际与边际分析[M].张定胜,张永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 [8] 鞠建东,余心玎,卢冰,等.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三足鼎立”格局分析[J].经济学报,2020(4):1-20.
- [9] 洪俊杰,商辉.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共轭环流论”:理论与证据[J].中国社会科学,2019(1): 42-64.
- [10] BAKER S R, BLOOM N, DAVIS S J. Measuring 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6, 131(4): 1593-1636.
- [11] 崔晓敏,熊婉婷,杨盼盼,等.全球供应链脆弱性测度——基于贸易网络方法的分析[J].统计研究,2022(8):38-52.
- [12] 肖兴志,李少林.大变局下的产业链韧性:生成逻辑、实践关切与政策取向[J].改革,2022(11):1-14.
- [13] AUTOR D H, DORN D, HANSON G H.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J].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6, 8(1): 205-240.
- [14] ASQUITH B, GOSWAMI S, NEUMARK D. US job flows and the China shock[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18: 123-137.
- [15] DI GIOVANNI J, LEVCHENKO A, ZHANG J. The global welfare impact of China: Trade integration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Macroeconomics, 2014, 6(3):153-183.
- [16] 吕越,陈帅,盛斌.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导致中国制造的“低端锁定”吗?[J].管理世界,2018(8):11-29.
- [17] 刘斌,李秋静.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与中国企业创新[J].财经研究,2023(12):19-33.
- [18] 余典范,王佳希,张家才.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以美国对华实体清单为例[J].经济学动态,2022(2):51-67.
- [19] 曾国安,苏诗琴.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江汉论坛,2023(10):13-21.
- [20] 李先军.“十五五”时期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创新发展:外部形势、发展趋势与政策选择[J].改革,2025(3):38-52.
- [21] 杨志浩,洪俊杰.制度型开放促进了本土企业创新——基于标准开放视角[J].经济学

(季刊), 2025(3): 613-630.

72-87.

[22] 杨志浩, 洪俊杰. 标准开放、中外标准互通与企业内外销并举[J]. 国际贸易问题, 2025(8):

[23] 陈彦斌. 宏观政策“三策合一”新理论框架[J]. 经济研究, 2022(11): 29-47.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s Comparative Advantage

YANG Zhi-hao ZHANG Qi-zi

Abstract: The current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presents three major characteristics: "slow globalization", "re centralization", and "super sensitivity". The position of China's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extends from downstream to upstream, and the embedding mode has evolved from product export mode to production capacity export mode. The embedding space has shifted from offshore integration of the entire industrial chain to differentiation of heterogeneous industrial chains. The United States is a main force driving the current round of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breaking the increasingly converging economic steady state and promoting a "major reshuffle" of glob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are the underlying logic behind the United States' efforts to promot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tructuring.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strategic goal, the United States has adopted strategies such as technology blockade, manufacturing reflux, resource plundering, and order disruption towards China, attempting to weaken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erms of relative efficiency, economies of scale, institutional costs, and factor endowment, ultimately forming a structural power. To address this challenge, China must leverage the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o accelerate the productivity of emerging industries, prevent the convergence of productivity between domestic new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and cultivate efficiency-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By relying on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data facto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ir diversified combinations with traditional production factors, China can achieve a multiplicative expansion in the types of production factors and a leap in quality, fostering factor-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rise of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worldwide, China can achieve higher levels of economies of scale from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cultivating scale-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By capitalizing on the reform opportunities of steady institutional opening-up, China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institutional costs of an open economy, fostering institutional-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Guided by the consistency of macro-policy orientations, China should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s of industries with efficiency-based, factor-based, scale-based, and institutional-base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forming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building structural comparative advantages.

Key words: industrial chain reconstruc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责任编辑: 杨果)